

为生命充氧

黄齐国作品选

解放军出版社



我喜欢的名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我们的准则：

用自己的双眼看世界
用踏实的双脚走人生

—— 吴育国

黄齐国，男，在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军事报道》栏目任职。职务副师，军衔上校，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1976年1月从湖北省谷城县入伍，历任战士、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组织科科长。曾在团、师、军、军区任新闻干事，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10年，解放军报特约记者12年。1992年2月调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局，1996年4月到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至今。

作

者

简

历

20多年军旅生涯，主线新闻写作，副线机关工作，偶有文学创作。在各种媒体发表作品千余篇（部）。曾出版《人生大裂变》、《新时代的活雷锋——张子祥》等书，参与编辑了《成才足迹》、《徐洪刚》、《韩素云》、《李国安》、《记住这段历史——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等书。作品一次获中国新闻奖，两次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三次获全国广播好新闻特等奖，获各类征文奖20余次。曾参与大胡子师长吴长富、张子祥、苏宁、徐洪刚、韩素云、李国安等重大典型宣传。1次荣立二等功、6次荣立三等功。

序

赵可铭

当黄齐国同志把厚厚一摞书稿拿给我看的时候，我的确很高兴、很欣慰。

看到这 50 多万字的书稿，我由衷地称赞齐国同志这些年辛勤耕耘的执着精神。大凡做新闻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体会，在有限的新闻生涯里，如果能有三五篇获奖作品，有一两个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强烈共鸣的典型，就算是幸运的了。翻阅这本作品选，发现竟有这么多在全军、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典型，能与黄齐国的名字连在一起：大胡子师长吴长富、新时代的活雷锋张子祥、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苏宁、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徐洪刚、好军嫂韩素云、模范团长李国安……这一个个名字，不仅在当时响遍全国，就是今天，人们对他们也仍然记忆犹新、耳熟能详。除了典型报道，还有那么多获奖作品，而且不少得的是全国性大奖。这些，对于一位从部队最基层走过来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实属不易。

说起成果，齐国同志看得很淡。他说，是自己幸运，总“碰上”事迹特别过硬的典型和不错的题材。其实，这只是道出了事情的一半。有人说，机遇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作为一名曾在新闻战线工作多年的老战士，我深知做新闻工作的艰辛。要想在这个行当干出一番成就，是需要经常夜不能寝，呕心沥血的。我知道，齐国从开始搞新闻直到现在，一直干得很苦。据说，他在被调到沈阳军区机关之前，几乎没有深夜 12 点以前睡过觉。其实，生

2 ☆ 为生命充氧

活中好的新闻题材并不少,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变革的年代;问题在于记者识货不识货,能不能把它宣传好。这里边原因各异。有投入精力的多与少,有驾驭题材能力的高与低,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看对党的新闻宣传事业钟爱的程度。齐国同志之所以成绩突出,重要的是取决于他对新闻事业的挚爱。1991年,总政宣传部准备调他的时候,考察他的同志回京后对我说:这个人是个工作狂。接着,他们给我讲了齐国抓张子祥典型宣传的过程:1989年,齐国从军区机关去部队任职时,受朋友之邀去另外一个团研究报道线索,发现了张子祥这个典型。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便穷追不舍,先是做深入扎实的采访,尔后再到师、军、军区提出宣传建议,再后是进京向总政机关和新闻单位汇报。当张子祥被作为重大典型确定下来时,已到了春节。为了不失时机在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之前把这个典型宣传出去,齐国执意留在北京,驻在军报简陋的招待所里。大年三十、初一吃着方便面,埋头写作。等节后大家上班时,他把给中央电台和军报准备的两套稿子送到了编辑面前。2月19日,中央电台和解放军报同时推出这个典型,立即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李鹏同志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向张子祥学习。接着,其他媒体都来向齐国索要稿件,新华社播发的通稿《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在全国百余家媒体刊播。黄齐国和李选清同志为宣传张子祥这个典型,付出了极大辛劳,在两个月的时间,经常加班加点,很少休息。正因为这件事对我的印象很深,所以现在看到书稿中有关张子祥的报道,还是感到那么亲切。

翻阅齐国的这本书稿,我还有一个突出的印象:深入基层,接触实际,是新闻工作不竭的源泉。从书稿中可以看出,这些年齐国采访涉猎面很广,军事、政工、后勤、装备、科研、院校几乎都涉足到了。从采访写作的对象看,上至军委领导,下到基层官兵,都是他文中的主人公。尤其是,从书稿中可以看出齐国对军队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很强的理解力。这一点,首先得益于他的生活阅历,

经历过从连队战士到总政机关干部之间,包括团、师、军、军区等各级机关的工作锻炼。这成为他了解军营,了解军人所独有的生活积累。在进入高级机关以后,他警惕自己会脱离实际,从不忘深入基层。这一点,从本书的开篇文章《为生命充氧》里,就能感受得到。从京城远赴新疆,可去的风景、游览区很多,可他执意要去气候恶劣的边防,要上举步维艰的五〇四二哨所。实际上,这一选择是可贵的。上得山去的感慨,是那些长年生活在内地、都市里的人们如何展开想象的翅膀也想像不出来的。看了其中的文字,真让人从内心深处受到感动。不深入基层,他如何会具体了解边防战士的苦与乐?不接触实际,他怎么会想出“为生命充氧”这种极富哲理,极富韵味的题目来呢?

有人说,新闻是易碎品。也对也不对。一条一条新闻每天都在告诉世人新近发生的事实,许许多多的新闻同时也在记载历史。本书中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扑火的报道,10多年以前是新闻,现在看就是一段历史,一段人民军队可歌可泣的历史。通过这些文字记载,人们可以追忆当年火灾的损失,火场的场景,扑火的英雄以及扑火所凝聚起的精神。昔日的新闻,真实地记录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因此我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好记者,就必须踏着时代的节奏,追赶时代的浪潮,展示当今时代最活跃、最富新意、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实际上,要想把“易碎品”变成不朽之作,决不是逃避现实、逃避生活所能得到的。只有在具备相当理论功底和生活积淀的支撑下,去介入生活、干预生活;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去发掘事实、揭示本质,才有可能使自己手中的作品化“易碎”为“不朽”。齐国同志的这本书虽然只是一部个人作品集,但浏览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军在新时期所走过的历程。

本书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在每一个完整的宣传系列之后,作者都附加了一个“业务报告”。我看了其中的几篇,虽称业务报告,实际上每篇风格各异。有的可称为业务论文,如从《大型系列

4 ☆ 为生命充氧

报道〈请祖国检阅〉论成就性宣传的策划与拍摄》。有的亦可叫报告文学,如《李国安宣传备忘录》。虽然写法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披露典型宣传的内幕、探讨写作规律。这些,无论对新闻工作者特别是年轻同志、还是对广大读者,无疑都是有益的。

党的新闻工作是一项很崇高、很神圣的事业。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宣传战线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新闻界作为宣传战线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为落实好这一指示付出了积极的努力,作出了很大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齐国作为新闻工作者队伍里的一员,时时牢记江总书记的指示,勤奋学习,艰苦深入,精心写作,从他的笔下流淌出的作品,反映出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新时期,人民军队的精神风貌,反映出我军将士崇高的思想、道德和情操。这些新闻作品,与同时代许许多多优秀新闻作品一道,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衷心地希望齐国继续努力,为党的新闻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有感而发,写下这些文字。是为序。

2000年4月12日

(作者系国防大学副政委、中将)

我的独白

——代前言

在人类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稿交给出版社,既诚惶诚恐,又兴奋异常。

这是我从事所挚爱的新闻事业的一份心血,一点结晶,尽管她还显得有些稚嫩、粗糙,但她毕竟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所以我珍爱她。

—

1976年,那个多事的龙年。我从鄂西北那个叫谷城县跃进林场的地方穿上了一身并不合体的军装,茫茫然踏上了军旅生涯。之所以说茫然,是因为那时的我对未来的人生去向完全是一片空白。当闷罐车开进辽东那个叫宽甸县永甸公社的地方的时候,听说铁路还有一站就到头了,前面就是中朝边界。有战友问:“齐国,你有什么目标?”我说:“要是有机会去趟丹东,看一眼鸭绿江大桥就好了。”那时,我真的没有任何奢望。当我日后一级一级地被调到营部、团部、师部、军部、军区机关直至总政机关的时候,我始终没忘我当时对战友说过的那句话。

那时,我的目标虽然不够远大,但步子迈得却很踏实。新兵训练,虽然身体素质不占优势,刻苦程度却不逊于他人。手榴弹投掷,起初不到30米,经过昼夜苦练,终于突破了40米。新兵刚一

2 ☆ 为生命充氧

分配,我就随老连队——红军二连奔赴辽西的盘锦农场执行“特殊任务”:种水稻。据说,在我们农场的附近,是张志新烈士曾经劳改过的地方。一些新战士见工作生活如此艰苦,想打“退堂鼓”,并说:“早知道到部队要来种水稻,还不如让我爹来哩!”对于我来说,苦是有些苦,却没有半句怨言,而且在完成工作量的同时,早晨自觉早起床一个小时,为老兵打好洗脸水,挤上牙膏,尔后去场部拉来石灰,把连队厕所打扫一遍。晚上要坚持写一篇日记,偶尔为连队黑板报写点短文、表扬稿什么的。不久,我的这点“才气”被指导员孙红昌发现,居然堂而皇之地当上了连队的“理论骨干”。这一年,我原本就瘦弱的身躯更加瘦了。1976年年底,连队从农场回到团里,正赶上团政治处报道干事李明亮四处寻找“报道骨干”。孙指导员原来在报道组写过稿,他向李干事推荐了我。在让我试写了一篇题为《提前三秒钟》的小故事之后,我便成了团报道组的一员。

二

进入团报道组,我仍然还是茫然,茫然到起初我连在报道组究竟要干些什么都不清楚。报道干事是个不多言语的人,他告诉我:“你的任务就是下连队采访,然后写稿、投稿,争取见报。”于是,我便成了一只无头的苍蝇,到处乱跑、乱碰。运气倒是对我不错,我写的第一篇小稿《连史编写组又建立起来了》,居然不久就在《解放军报》刊登出来了。

初战的胜利,使我多少摸到点门道,也使领导们更加器重我。从此,我便一发而不可收,常有“豆腐块”、“萝卜条”似的稿件见诸报端。正在这时,团里新调来一位政治处副主任,叫蒋立才,是军报道干事下来任职的。起初,我最“吸引”他的,可能就是办公室夜晚不灭的灯光。他每每到这里看上一眼,总是见我像回事似的正

襟危坐，苦思冥想。再往后，他就主动把我写的稿子拿过去看，然后指出优缺点。再往后，他就常说这么一句：“我看黄齐国这小子是块料。”

一天，从师里来了一位干部科副科长。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挑一位战士直接提干，去师干部科当干事。这位姓杜的副科长把我写的稿子及几本笔记都调去看。起初，我并不知其中用意。那天，我正要给蒋副主任送篇稿子看，还没敲门，就听他对杜副科长说：“黄齐国我们要留着当报道干事，你还是另外再挑一个人吧。”接下来的话，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我先是一愣神，尔后恍然大悟，拔腿就往后山上跑。跑呀跑，我爬上半山腰，面对旷野不由自主地喊道：“我能提干？我能当报道干事？难道这是真的吗？！”

事情果真当真。1979年初，在我军改革干部制度、基本不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的当口，我穿上了“四个兜”的军服，堂而皇之地成了一名军官。

三

回忆这么多年搞新闻的历程，我感觉最难的是在师团两级。因为在这两级搞报道的人，一般都比较年轻，缺乏经验。加之报道面和题材的限制，要想搞出有影响、有深度的报道来，的确很难。1981年春，当我被调到师里当报道干事以后，的确有一段想打退堂鼓。面对比自己兵龄老5到10年的各团报道干事，面对相当一段时间的屡写不中，我甚至产生过怀疑：我是搞新闻这块料吗？

然而，事情的成功往往是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也许是领导和同事们的鼓励，也许是我太热爱这项工作，干劲加拼劲，终于使我闯过了难关。在师里当报道干事3年，我给师里扛回了3面红旗。有一年，我所在的师上稿的数质量竟然超过了该师从未超过的甲师。那年，在军区召开的新闻工作表彰会上，军区机关

4 ☆ 为生命充氧

让我“介绍经验”。冠冕堂皇的话人们早已淡忘，唯有一句话至今还有人向我提及，这便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句话虽然多少带有些调侃，却也道出了部分真谛。那时候，谁要让我轻易认输是不可能的：都是七尺男儿，我怎么就会比别人差？年轻 + 干劲 + 韧劲，也许就是我那时工作的写照。

1983年初，军机关和军区机关好像是同时向师里商量调我。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师机关就是大机关了，从未梦想过再“往上走”。况且，我和“上面”除了合作写稿也没有什么联系啊。记得年前，军区新闻科的副科长林少先到师里采访，赶上师汽车训练队刚协助一家工厂扑灭一场火灾。我和林副科长一起了解情况后，他让我先起草一稿。之后，我给他呈交了一份题为《一靠牺牲精神，二靠科学态度》的新闻。林少先看后，赞赏我角度选择得好，说它跳出了以往抢险报道的老套，抓住了科学态度这一有新意的东西。这条新闻经过他的修改，不久在解放军报一版刊登。除此之外，我还给军区新闻科的李之熙科长寄过稿子，还陪同王兴功干事在团里作过一次采访。此外，与“上面”再也没有其他“瓜葛”。

也许是听到什么“风声”，军里是“先下手为强”，赶在军区之前一纸命令把我调往军里当了新闻干事。阳春三月，我仍是茫茫然赶往军里报到。不到半年，军区终于和军里协调成功，不等我把军报道组长的椅子焐热，我又茫茫然赶到沈阳——军区新闻处报到了。

记得我到军区报到之前，两级机关为调我处于胶着状态时，军宣传处的一位领导说：“这事还是听听黄齐国的意见吧，看他还是想去还是想留。”接着，老处长找到我说：“你在这里是条龙，到了大机关就是一条虫。何去何从，你要想个清楚。”老处长的话虽然不大中听，也可谓语重心长。然而，我犹豫的心反而被他的话触动了：再大的机关也需要干活的人，我就不信我这条虫爬不出去。到了军区机关以后，我的耳旁时不时想起老处长的话，浑身就像凭添了

一股力量。

四

在当兵的第8个年头，我走进军区大院这个可以被称为“大机关”的地方，在这里一干就是10个年头。那是一种怎样的10年？我一时很难用语言把它概括出来。抽象一点说，这是我积累经验并施展能力的10年，是我尽情大干又收获颇丰的10年，是我这一辈子任何时候回忆起来都会让我心动的10年。

军区新闻处，那是一个让我感到温馨、奋发的称谓。当时37岁的处长林少先，如今早已成为将军，在一个集团军当副政委。可我们这些比他晚几茬的年轻人如今见到他，还一口一个“老林”地叫，相互间那么和谐。当年先是副处长、尔后当处长的王兴功，现在当了中央电台军事中心的主任，我们还是亲切地称他兴功。还有比我早去新闻处许多年的赵险峰，比我晚去的赵明、张晋生、刘世仁、肖福恒、徐建平，尽是些在新闻界提起名字都尽人皆知的人物。那时候，全处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可干起活来却是较着劲儿，谁也不甘落后，谁也不服输。

记得刚去新闻处不久，我就接受了一项任务，跟军区纪委去调查一起违纪事件。我们来到驻辽西的一个坦克师，调查这个师组织科副科长石生才因坚持原则受打击的事。调查组越刨根问底，牵扯的人和事越多，其中直接牵连到已经被提拔到军领导岗位上的老师长，还有师政委等领导。调查组事实是搞准了，可回到机关却犯了犹豫：这事是否往上报？如上报牵涉这么多人怎么办？

这时的我，却有些耐不住性子。我先是起草了一个通讯，题为《宁可得罪人、决不辜负党》，送到军区《前进报》并寄往解放军报社。前进报社的编辑看过通讯，拍案叫好。然而稿子几经审改，四五千字的通讯最后变成了一个400多字的消息。我不甘心，便把

6 ☆ 为生命充氧

稿子拿给新华社军区分社的黄明松社长。老黄看过稿子，很是激动，便让我把通讯改为内参。不久，这篇内参居然刊登在供中央政治局领导阅读的《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内参的当天，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鹤寿同志，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同志均做出批示：石生才同志的事迹很感人，请军委纪委派人员核实，妥善处理。

一个小小的内参，会引起这么高层领导的重视，是我始料未及的。不久，军委纪委派来了调查组，牵头的是总政纪检部调研处副处长段达球同志。老段原是军报的编辑，我原本就跟他认识。这次，我再次与调查组前往辽西军营，一番调查核实，印证了我内参所写的内容。接着，一个庞大的宣传计划和处理方案，又让我始料未及。

1984年年初，反映纪检干部石生才敢于碰硬的长篇通讯赫然在《解放军报》的一版头条刊出，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并由此掀起了一轮宣传浪潮。这以后，“敢于碰硬”这个词几乎成了纪检工作的常用词汇。同时，与石生才事件相关联的有关领导得到了严肃处理，石生才本人也因此被调到集团军机关做纪检工作。

这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石生才，也再也没写过如此强烈的干预生活的报道。据说，石生才被调到军里后在许多事情上仍然与人有些格格不入，没几年工夫也就转业了。事后多年，有朋友问我：“现在让你去写石生才，你还敢写吗？”我想了想，未置可否。我一时真的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毫不犹豫，毫无顾忌地去写。当时，我这个涉世未深的新闻干事的所作所为，还是验证了我前几年在军区发言时说过的话：“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五

石生才的宣传，是我调到军区机关后打的第一“炮”。从此，我那不知疲倦的劲头似乎更足，跑新闻、写稿子简直成了我生命中不

可或缺的内容。我常常要一个星期给报社发出三四篇稿子,如果隔几天要在报纸上看不到自己的作品,就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应该说,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下工作,不出成果是不可能的。那几年,我每年在军报上稿大都在几十篇,有一年光一版头条就有9个。1986年,中央电台在各大军区设立了记者站,新闻处稍老一点的干事都被聘为电台军事记者。领地的拓展,更给自己创造了释放能量的舞台。从此我便左右开弓,声字并举。尽管别人包括家人对自己做的事有时并不以为然,而我自己却是马不停蹄、乐此不疲。

忽然有一天,我打破了自己内心的宁静与自满。我发现,这些年我写稿不少,见报不少,但却提高不大,知识积累的亏空和理论功底的浅薄,已经成为阻碍自己业务水平提高的障碍。这时,南京政治学院已经开办新闻班,我便提出去学习两年。领导却说,你正是出作品的时候,还是边干边学为好。于是,我从此踏上了漫长的自学之路:先是上辽宁大学大专函授班,要知道,当时是我们的老司令李德生当校长啊!之后,又上了中央党校本科函授班;再往后,还上了石家庄参谋学院电视编导本科班;直到去年,我才刚刚上完北京广播学院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尽管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边干边学,但我一直遗憾于从未脱产进过大学学堂,一直遗憾于自己功力的浅薄。

为了弥补这些缺憾,我还试图从别的方面做些努力。比如我喜欢文学创作,早年却无缘登大雅之堂。到军区机关后,我结识了当时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几位作家:《最后的蜃壕》和《三角梅》的作者王中才;《雪国热闹镇》的作者刘兆林;《雕像》的作者胡世宗;还有宫奎斌、李占恒、张正隆、庞天舒、吕永岩等等。更有幸的是,我还有机会与著名作家浩然结识,并长时间保持着友好往来。就是在这些作家的熏陶、带动下,我连续几年参加军区组织的文学创作笔会,他们不仅使我学会了一些文学创作的技巧、思维,还把

我领进了跳交谊舞这种既陌生又新鲜的领地。这以后,我创作的一些报告文学、散文什么的,居然也登上过《解放军文艺》的头题和一些有名的期刊杂志。同时,我还被这些作家拉扯加入了作家协会,成了一名名不副实的作家。

六

应该说,我新闻生涯的第一个重要亮点,出现在我30岁那年。1987年的5月6号,大兴安岭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我有幸成了第一批赶赴火场最后一个撤离火场的战地记者。有关参加这次抢险报道的过程和细节,本书有关章节将有详细回顾,这里不再赘述。有朋友直到现在见面还开我的玩笑:“大兴安岭一把火,全国都知道黄齐国”。事后直到如今,每每回忆起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总是能从心底涌出一丝欣慰。实际上,当时领导的赞扬,组织的表彰,甚至于挂在胸前的二等功奖章,如今对于我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段历史中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我当时苦过、累过、付出过,但这一切都充盈在青春的年轮里,使我的生命少了几分浮躁,多了几分成熟。我觉得这就是我参加扑火报道最大的收获。

1990年,也就是在我33岁的时候,那是我迄今为止生命的一个顶峰。这顶峰是因为一个典型的成功宣传铺就的。这个典型就是张子祥。起初,我怎么也想像不到,一个普通志愿兵的宣传,会在全中国引起这么强烈地反响。2月下旬的那段时间,我这个在北京送稿的普通干事,居然成了首都新闻界追逐的热点。新华社找到我,索要我给电台写作的长篇通讯的原稿;中央台和军报催我们抓紧搞好后续宣传;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通过团委书记郭书兰找到在中央电台工作的丈夫,辗转找到我让我去台里讲一次张子祥宣传的经过和体会。事后我才知道,那一段我的名字在沈阳军

区“炒”得更热。据说，宋克达政委专门到军区政治部办公会上为我请功……

如今，这鲜花、掌声、褒奖都已烟消云散。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位普通听众写给我的信。他说：“你用自己诚实的劳动，为全国人民在动乱之后烦躁的心里点亮了一只火把，我代表我周围的这些老百姓，衷心地感谢你。”

也许，这就是一个记者真正的价值所在。在空气一度污浊的时候，你能通过手中的笔给社会送去一缕新风；在有人一度迷惘的时候，你能够通过一个典型给人们树立一个标杆，这不正是一个记者社会价值的体现吗？其实，为了一个典型的推出，牺牲一个春节的休息时间，耗尽两个月时间的心血，在人的一生中算得上什么呢？俗话说，人生能有几次搏，当成功的机遇到了你面前的时候，如果不抓住它，它就会稍纵即逝。事后，有关我的“新闻”在全军许多部队流传。多数是讲述黄齐国如何吃苦，如何春节不回家抓出张子祥这个典型的。也有的说：“黄齐国宣传张子祥发了，沈阳军区一下子给他提了两职。”还有的说：“黄齐国搞张子祥宣传立了一等功。”等等传说，版本不少。但当他们见到我证实这些话不过是美好的传说时，大家只是会心地一笑。对我来说，宣传张子祥后领导给我提前从正营职晋升为副团职的奖励，已经是足够足够。其实，只要把我们的思维稍作调整，你就会有更加美好的心境：即便没有奖励，你搞典型的过程中受到的锻炼，你通过这件事情之后的人生积累，不同样是一笔丰厚的“财产”吗？

七

大兴安岭扑火报道和张子祥的宣传之后，我自己跟自己比，的确感到长大了许多，成熟了许多。我总结了一下，直到这时，我大致经历了3种境界：初学写稿时，胆子很大，什么都敢写。素材到

手不用更多地斟酌,很快就能出稿子。可想而知,这样出手的稿子质量大致都不高。偶尔碰运气,个别稿子不仅发表了,而且还能得到些表扬。此乃第一种境界。第二种境界,我是在师里时遇到的:什么都不敢写,怎么写都觉得不好。应该说,这是一种进步。有了以往的经验,对出手稿件的标准提高了,而自己认识事物的能力和文字水平又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此乃困惑期。初学写作的同志,冲破这一关至关重要,它是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如果在这里打了退堂鼓,你很可能一事无成。坚持、坚持、再坚持,咬咬牙冲过去,你就可能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那就是第三种境界。这时,你对所采访的东西基本上都有一个判断:它的意义在哪儿,针对性在哪儿,怎么谋篇布局,如何使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更新颖、更有深度。在这种境界下,出手的稿子一般来说质量较高,命中率也会高些。

遗憾的是,我可能至今也没能突破这第三境界,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和阅历的丰富,我自己也在不断地进步倒是事实。1989年初,我从军区机关回到老部队任职,在营里当教导员。不久,师、团机关都来找我:“我们不缺当教导员的人,你还是帮我们写点稿吧。”面对这种信任和委托,我也有些犯难:以往习惯于在全军区选择题材,而现在只能局限于一个团,这稿子怎么写?嘴里虽然这么说,我还是力所能及地做沙里淘金的工作。凡拿到手一个题材,不轻易出手,而是反复玩味,反复斟酌,然后一气呵成。这一年,我为所在的这个红军团在《解放军报》发了4个一版头条,还有10几个一般的新闻,师里的政治部主任李龙拍着我的肩说:“你小子还真够可以的!”我笑着回答说:“这是逼上梁山啊!”

也正是在基层任职的这一年,我有一次进解放军报社工作的机会。但这机会很快就化作了泡影。后来回到军区机关,领导给我说:“听说军报要调你,孙部长一天之内就把你的关系办回了机关。”这孙部长叫孙忠同。如今,他已经在解放军报社任社长多年。